

第一章 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徘徊

一、难产儿“不战决议”

女议长分娩难产儿

空空荡荡的国会，稀稀拉拉的人群，通过了一个有气无力的“决议”——1995年6月9日发生在日本的事情。

6月夏季酷暑闷热难耐，这就是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和描述。然而，6月9日这一天，在日本，在东京，在国会大厦，在众议院会议厅，人们感受不到夏日对皮肤的刺激，因为空调已把室温调到适宜的度数，但每个人却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仿佛他们正承受着高温的烧烤。有的人指指点点，有的人慷慨陈词，有的人不停地走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牵动着他们，使他们吵吵嚷嚷，无止无休。原来，是一个什么决议。他们今天来此，就是要通过这个决议。决议，便是一个火星，点燃了他们内心之火，使他们难以平静。

光临议会大厅的是国会议员，他们之中，有属于执政党的，也有在野党的。这时正是三党联合执政。执政的三党分

别是社会党、自民党和先驱新党。虽说首相村山富市出自社会党，但势力强大的自民党与其他党联手却控制着国会，处处掣肘着首相，动不动就给首相以颜色。就拿今天拟通过的“战后 50 年国会决议”（简称“不战决议”）来说，尽管三党联合政权于 1994 年 6 月成立时，三方曾达成政策协议，要以战后 50 年为契机，通过一个反省过去的战争、表明对未来和平的决心的国会决议。但当 1995 年初社会党首先提出这样的决议时，自民党议员却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反对的言辞不绝于耳。国会辩论时，那些自民党议员个个成了国家利益至上者，而赞成决议者反倒成了民族的“败类”。至于暗中作梗，施展政治伎俩，玩弄政客手腕，更是司空见惯，乃至是公开秘密。有时，当他们不得不坐下来就决议草案进行磋商时，那更是热闹非凡，你来我往，唇枪舌战，互不相让。你拿出一个草案，我抛出一个文本，三个党，摆出三份“决议”。要把这三团“面”捏合成令各方满意的“型”，难坏了那些自命不凡的国会议员。往日的高傲没有了，个个显得束手无策，真所谓“才到用时方恨少”。有时，为了挑选一个词儿，他们翻遍所有的词典，用尽各自拥有的全部知识和本领，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仍搜索不到一个他们中意的词儿。就这样，日复一日，从 2 月下旬开始，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直到日历牌显示出 6 月 9 日这一天。

此时的首相村山富市，更是心情复杂，表情凝重。当社会党提出要搞个关于“不战”的决议时，他对困难的估计严重不足，没想到来自自民党的阻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使他感到难以招架，甚至力不从心。这还不算，还有那个新进党，更是令他心烦。虽说它在野，没成大气候，可它的“分量”却不可小视。它是仅次于自民党的第二大政党。从组织成分看，它是一支

地道的“杂牌军”内部各集团在利益分配上常闹纠纷，政见不同很难协调，限制了该党力量的发展。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该党便使出了一个杀手锏，从联合执政三党内部挖墙脚。为此，它对自民党暗送秋波，拉自民党，为日后与这个党部分势力联手埋下伏笔。所以在反对“不战决议”上，它们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具有自民党鹰派的特质：一硬到底，死不回头。村山首相这两个友党实在无计可施，显得极为无奈。这也难怪，他所在的社会党本不是自民党的有力对手，现今虽在一起“联合”执政，但总有点小兄弟在老大哥面前似的，看着别人的眼色办事，束手束脚，很难放开。自民党也毫不客气，颐指气使，唯我至上，它像一股强大的漩涡卷着作为“主流”的社会党而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自民党执政数十年，社会党一直以在野党与之对峙，曾一度颇有声势，在国内外有些影响，为中日友好也曾尽力。但自 90 年代初执政以来，它调整了政策，逐渐消除了与自民党的差异，不满此种转向的党员骂它与自民党合流，脱离了它，分离出去，一些拥护它的选民也抛弃了它，社会党因此被削弱。它已无力同自民党硬抗。村山首相难言之隐，即在这里。既如此，何必非要搞这个决议，自讨苦吃？倒不是村山首相和他的顾问们是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好汉，而是他们有更大的隐痛，不能不强撑着去干这种难办的事儿。在同自民党相抗衡的年代里，在野的社会党高举了两面大旗：一是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二是反对不断扩大力量和职能的自卫队，颇得人心，也凝聚了全党。而今，路线转变了，政策随之调整，昔日竭力反对的成了今日尽力维护的东西。日美安全条约，它认为要继续坚持；自卫队么，符合宪法。砍掉了这两根支柱，社会党靠

什么来维系全党，争取人心？没有别的，现在它抓住了这个决议，不说是救生圈，也算个庇护所。有了它，可以在公众中重塑社会党的形象，也能使全党同志有个近期的目标，去为之奋斗，不会因丧失目标而散伙。为了自己的党，村山首相只好知难而上，硬着头皮去闯，吃点苦头，遭些奚落，又算得了什么？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显示屏不断显示出到会的人数，这已令议会的主持者皱眉。而另一组数字则更令她心寒：众多的议员告假，其理由可谓五花八门，有的什么理由也没有，干脆是“不能出席”。不能出席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从应到会数的 $\frac{1}{5}$ 到 $\frac{1}{4}$ 到 $\frac{1}{3}$ 再增到 $\frac{1}{2}$ 。众议院议长和热心于通过决议的社会党议员、部分先驱新党议员的心如温度不断升高的沸水，终于翻腾起来。正在此时，一声清脆的声音从主席台上传来：“现在开会！”

人们把目光射向主席台，一位很有风度的中年女性出现在台上，她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女士。她表情平静，落落大方，显出政治家的风度。在就任议长之前，她是社会党的委员长，曾带领她的党在政坛驰骋，赢得人们的赞誉和羡慕。在日本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像她这样的女政治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此时站在台上的她，特别是眼前面临着这样的场景：空空荡荡的国会大厅，稀稀拉拉的议员先生，即使她克制力再强，也免不了内心的酸楚，难以拂去脸上的忧虑。她是这个决议的倡导者，也是这个决议的推动者。当她还是社会党委员长时，1988年“终战纪念日”（即日本投降日），她提议以党的声明的方式作出“清算殖民地统治的决议”。如要追根溯源的话，这便是今天国会决议的起始。她有些懊丧，却必须强打精神。她环视四周，再看看显示屏，到会

人数似乎还在继续减少，已不足全体议员的 1/2 新进党竟无一个议员露面。不能再拖延了，更何况，天色已暗，从下午进入夜晚，她毅然宣布开会。

议员先生其实也早不耐烦，今天的情景已在他们预料之中。该到的都来了，不来的再等也不会来，何必耽搁时间！当听到议长宣布开会，会场逐渐静了下来，但小声的议论仍夹于其间。

“各位议员先生 今天的议程是审议通过‘战后 50 周年国会决议’。”女议长稍停 她继续讲下去：“决议草案广泛听取了朝野各政党意见，由执政三党反复磋商，经一百多天努力草拟出来的。”这一百多天，是何等的滋味，她已领受了。说到这，她没有兴奋 只有道不出的苦涩。“宣读决议！”说完 她即刻离开主席台，到议长席就位。

宣读决议极为容易，它连标点总共不足 200 个中文字 在日本国会决议中，是少有的简短。何况每位议员手中都有决议副本，只要瞟一眼，就一目了然。

决议全文是：

值此战后 50 周年之际，对全世界的战歿者及死于战祸的人们谨表诚挚的悼念。

联想到世界近代史上众多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性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的这些行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带来的痛苦，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我们要超越对过去的战争的不同的历史观，谦虚地吸取历史教训，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

在日本国宪法所倡导的永久和平的理想之下，我们决心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开辟人类共处的未来。

“决议”宣读完毕，既没有出现轰动，也没有喧闹，反对者没有来，来到的本不持异议。在相对平静的气氛中通过了这项几个月来爆炒得风风火火、令政治家头昏脑胀的决议。

社会党议员终于欢呼起来，这毕竟是他们的胜利。欢呼者中也有先驱新党的议员，该党在政策上与社会党颇为接近，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自民党鹰派唱对台戏，比如在“不战决议”上就各唱各的调，充当了社会党可靠同盟者的角色。此时，他们从不同方向拥向主席台，向女议长表示祝贺，土井多贺子脸上泛出笑容，连声说：“多谢大家，多谢大家！”议员们簇拥着女议长，走出会议厅，像迎接得胜归来的英雄一样。

村山富市首相舒了口气。他感到沉重的担子终于卸下，轻松了许多，他逢人便说：“不容易呵，难办的事办成了，了不起！”

自民党议员却不那么轻松，他们咬定“我们不在场，不足半数议员”是“强行通过”。

当晚，电波传向世界各地。各大通讯社当即播发了新闻。次日，各国报纸发出消息，有的带有评论。对日本国会的“不战决议”最初，普遍反应是失望超过欢迎。

50年“怀胎”社会党催生

有人把“不战决议”比作难产儿，这是很贴切的。如果说它“产得艰难的话，怀它就更难啦。在战后日本社会这个母胎里，怀了整整50年，若不是社会党催生，谁也不知道何时会“产”下来，甚至还有人悲观地估计：说不定会胎死腹中。

1945年，当日本天皇亲自宣读投降诏书，日本代表在美国军舰上往投降书上签上自己名字时，人们无法知道，那位至高无上的天皇和那些骄横一世的日本人在内心里是否认为他们对亚洲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暂时的恭顺更多的是出于无奈。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可能被他们理解为对他们‘满不在乎’的一个注释。他们本没有罪。既无罪，当然也就不存在反省、道歉、认错、悔过，乃至赔偿等令人不快的麻烦。

但，有良心的日本人还是有的。对日本给世界、特别是亚洲人民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们有一种负疚感，也有一种责任感。这些日本人大多来自民间，也有的出自高层。民间中人，有工农大众、普通市民、中小业主、有些资产的商人，也有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党员，还有一些在侵略战争中充当炮灰的军人，这些人毕竟良知未泯，保留一点人类从善的天性。在高层人士中，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企业界显要，他们愿意正视日本进行侵略的那段历史，更放眼于日本的未来。他们主张，日本应承担起道义的责任，彻底反省过去，求得受害各国人民谅解，赢得他们信任。他们更重视对日本未来形象的塑造，认为日本应根据和平宪法，走和平道路。持这种主张的政要，在数量上不一定很多，其影响力也不能成为主流，但其存在却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发出的声音有时也很强。融民间和上层的这些人成为日本社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人们通常把它称为进步力量。它的进步之处在于：反省侵略历史，选择和平未来。这是他们用良心和智慧铸成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不战决议”的胚胎。还在那场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在日本社会的腹中种下了。

这个胚胎成长得极慢 极慢 乃至它需要 50 年方能成熟。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但只要剖析战后日本社会那个母胎，就不难明其究竟。日本初败，许多人不愿面对日本战败这个无情的现实，他们不接受却又无奈，他们挣扎过却无济于事。日子长些，一些人不得不吞下自己造成的苦果 承认战败的现实，仅此而已。他们并不认为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罪行，就是说 他们根本不认罪 更不用说服罪。于是，一些受到庇护逃脱惩罚的军国主义分子、旧军人乃至战犯又从阴暗的角落里走出来 或改头换面 或装束依旧地进入日本社会的各个层面 有的还堂而皇之走上政坛 充任首相 比如岸信介即是。此公有着极不光彩的历史，被定为战争罪犯。这个双手沾着中国人民鲜血的屠夫 当上首相后非但没有成佛 对中国人民的刻骨仇恨一丝未减。1957 年，他刚当上首相不久，就在 6 月窜到台湾岛 拜访蒋介石 给这位败退台湾、惊魂稍定、正作“反攻”梦的“总统”打气、鼓劲：“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统治下……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如果您收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一点不假。在日本国内 因臭味相同而投于岸信介门下 聚于其周围的是一大堆旧官僚、旧军人 他们视岸信介如救命稻草 更把岸信介看作一面旗帜 追随他 就能使“圣战光荣”的精神重新扬起。散而又聚，右翼势力重新聚合，形成战后日本政治的核心力量。自民党就是在这种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自民党连续执政数十年 表明日本战后的方向盘被这些人掌握住了 他们把车开向了亲美、反苏、反华、反共的歧途 跟着美国的战车左冲右突 哪里顾得上去清算、反省战争罪行 他们自己不愿，也反对别人去这样做，一当发现 便倾力加以扼杀。那小小的反战

胎儿，怎么能正常发育？

漫长的 50 年，整整半个世纪，人们对那场造成数千万人丧命的战争毕竟不能熟视无睹，尤其是日本，作为战争责任者，不能不对那段历史作出回应。回应当然是有的，只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势力作出的回应有所不同罢了。

让我们来听听历史的回声：

反省历史的，有之，如前首相细川护熙和村山富市，他们是清醒的政治家，负责的日本人。

幡然悔悟的，有之，他们愿意充当教育人的“先生”。如反战战士远藤五郎。1956 年，毛主席见到他，不无风趣地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样的“先生”是不可少的。过去他“教育”了中国人民，现在，正教育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立地成佛的，有之，特工高桥节夫、士兵种村一男等，人们可以列举出许多。他们能成佛，中国人民当然欢迎。

主持正义的人，更是有之，他们数不胜数。士兵东史郎、历史教师森正孝、小说家森村诚一，还有那些为花冈事件幸存者耿谆老人而奔走呼号的众多日本友人，他们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

这些日本人，他们有正义感，有远见，也有胆识，敢于冲击邪恶势力编织的罗网，对历史作出正确的回应，追求光明，呼唤和平，令人可敬可佩。正是他们护卫着那小小的反战胎儿，使它能得以发育、生长，成为保护和给胎儿以营养的“胎盘”。

平心而论，上述提到的日本人，在日本，毕竟是少数且分散，即使是一些组织，也规模小、力量弱，不能形成日本社会的

主流 他们发出的回应 尽管有力 然而有限。影响日本社会，决定日本走向 乃至掌握日本命运的是另外一些人 他们是日本政坛上的显要 包括天皇、首相、大臣和议员 他们对那场战争也作出了回应，他们和他们的回应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从这个主流中，人们听到些什么？日本主流社会是分层面的，人们只能分别听取。

天皇的“御音”天皇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是最高的权威。本来他应当对战争承担主要的罪责，美国的庇护才使他免于审判。中国和韩国 是战争最大的受害国 天皇是如何看待的呢？1984年昭和天皇在同韩国总统金斗焕会谈时，仅对过去“不幸的历史”表示“遗憾”；1990年现明仁天皇在会见韩国总统卢泰愚时 对过去的战争“感到痛心”算是进了一步。仍是那位昭和天皇，1989年在同李鹏总理会谈时，除了“遗憾”没有别的话。要说有增加的话 那是在1992年他第一次访华时 但那也仅是“深感悲痛”、“深刻反省”的老话和套话。实质性的表态 他一句不肯说 真是惜字如金呵！

首相的表态 田中角荣是对中国人民较为友善的首相 是他 开启了封闭已久的日中关系的大门 即使是他 在反省战争时显得也极为吝啬 不肯越过他们自己设置的界限 超过那个他们把握的度。1972年9月，他肩负着历史的使命踏上中国土地。最初，在同中国领导人谈及那场侵略战争时他竟轻描淡写地说“日本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轻得不能再轻 淡得不能再淡 他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不敢正视历史 承担责任。只是在中国方面表示强烈不满的情况下 才说出了“深感痛心”、“深刻反省”的话。其他的首相大多没超出“遗憾”、“反省”的范围 如果说有越出雷池的 那也是个别。海部俊树首

相 1990 年在韩国好不容易地说出“道歉”二字。对于那场战争的实质——侵略敢于触动的，也只有少数首相去冒险犯忌。先有中曾根康弘在前，1982 年底在“国际严厉的批评”下承认“这场战争是侵略”但他无法招架同僚的反对，立马改为日本只有“侵略的事实”继有细川护熙在后，刚说罢“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又改口说是“侵略行为”。最有胆量的莫过于村山富市，他既承认“侵略”，又表示“道歉”，但在首相里毕竟是凤毛麟角，在主流中是一个细细的分支。否认战争侵略性质，抵赖战争罪行，才是首相们表态的主流，他们的言论早已为人所熟知，以致无须再去罗列重复。

大臣和议员的言论，近些年来，人们已经听惯了一些日本内阁大臣们的奇谈怪论，以及同这些论调相联系的大臣名字，什么文部大臣藤尾正行、法务大臣永野茂门、什么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还有运输相石原慎太郎等等。往往是他们的高论一出，当即遭到国内外的抨击，而不得不摘下乌纱帽走人。因“失言”而丢官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如走马灯似的。令人费解、令人迷惑的是，一个个“丢官大臣”竟被人捧为“英雄”，迎着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他们非但不臭，反而更加吃香。有“英雄”开道在前，便有议员们紧随其后。丢掉大臣而当上议员的奥野诚亮还是谬论连篇，什么“日本没有同亚洲打过仗”啦，什么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啦，越讲越离奇。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由国会议员制造出来。108 名自民党议员炮制了一本《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书，竟“总结”出令人瞠目的结论：“托军国日本之福，亚洲获救了！”这就是他们对那场战争的“反省”。

天皇、首相、大臣和众多的议员用他们那珍贵的手编织了

一张网，把日渐形成并慢慢长大的反战胎儿罩住；砌成一堵墙，阻隔住外来的影响，哪怕是一点滋养也不能输入，让胎儿萎缩而亡。

反战的胎儿——“不战决议”的雏型 就如此被封闭着 挤压着，顶抗着极大的压力，无法正常生长，更不能如期临盆。50 年怀胎，谁也不知它的预产期。但它终究还是呱呱坠地，而这不能不归因于社会党的催生。

在战后日本政党中，对侵略战争有着较为深刻反省的要算社会党。在同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对峙中，反省战争，向受害者真诚道歉，是社会党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也是它赖以生存的支柱之一。为反战胎儿催生，社会党自然要动用这件武器。

1991 年 适逢日本偷袭珍珠港 50 周年 在野的社会党在国会提出一项动议 在 12 月 8 日这天 通过一项名为“不战和平”的国会决议。此议刚出 自民党立即挥起大棒 当头击去。第一次催生，未能成功。

几年后，社会党迎来了又一次机会。1994 年 6 月 成立了以村山富市为首相的三党联合政权 社会党抓住机会 与自民党和先驱新党达成一项政策协议，确认“以战后 50 年为契机 积极推动在国会通过一个决议 以表明对过去战争的反省和表明对未来和平的决心”。村山期望两个友党能把承诺变成行动 协助通过“不战决议”。事实是 只有风声 没有雨点。第二次催生 无功而终。

社会党两次碰壁，非但没放弃努力，反而更坚定了信心。1995 年新年伊始，村山就下定了决心。这次，他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推动这次催生活动的有两个关键人物，

扮演了重要角色。村山首相之外，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她在 1995 年的“元旦献辞”中，表现出要趁战争结束 50 周年之际在议会通过“不战决议”的强烈愿望。她的话铿锵有力：“我们通过拥有诚实地回顾历史的力量，以此来消除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面向世界开辟走向未来的道路。”在村山首相看来，“不战决议”通过与否，乃政治生命之所在，生死攸关。既然执政时就表明了态度，如果食言，何以取信广大党员和日本国民，又怎能止住社会党的“政治滑坡”？他没有退路，即使孤注一掷，不惜解散国会，内阁辞职，也在所不辞。他要付诸行动，采取强有力措施，无论如何，定要成功。

1995 年初，村山让社会党副委员长上原康助打头阵，一面草拟决议，一面与各党协调。首相估计，要是顺利，争取 3 月中旬在国会通过，以便在 5 月初带着这份“礼物”踏上出访中国的旅途。但，他显得有些天真，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有着同自民党数十年较量历史、称得上很有经验的社会党这次又失算了。自民党设置的防线极为坚固，封杀得甚是凶狠。社会党别无选择，拼命迎战，冲上去，进行一番厮杀搏斗。

这次催生成功。婴儿终于坠地。

封杀‘不战决议’的两名杀手

在‘不战决议’即将出世的紧要关头，冲出两名杀手，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封杀腹内的胎儿，不让他降临人世。这两名杀手，一个是自民党，一个是新进党。由此，展开了一场封杀与反封杀的搏斗。

社会党摆开了阵式，志在必得，说什么也要通过“不战决

议”。自民党毫不示弱，确定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作战原则。特别是国会中的自民党议员，大部分与社会党意见相左，他们常聚在一起抨击社会党，攻击“不战决议”，有时也把矛头指向自己党内赞同“决议”的头儿和同志。激愤时，有的议员常不顾自己的身份，失态更“失言”。他们拉开架势，与社会党对着干。在国会内干，也在国会外干。

第一个杀出来的便是死不认侵略战争罪的奥野诚亮，这位“丢官大臣”以反对认罪著称，一贯否定日本进行过侵略战争，称得上是一个“死硬派”。他咬定“日本不是侵略国家”，“没有侵略意图”，自然没有侵略过别人。要说打仗，是同美、英西方国家打，为的是把亚洲国家从他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既然如此，日本何罪之有？要说战争犯罪，奥野诚亮理直气壮起来：“美国投下原子弹杀害非战斗人员，旧苏联撕毁互不侵犯条约而进入旧满洲，把许多人拘留在西伯利亚，这叫什么？”话锋一转，使出推脱的手段：“战争双方都有责任。只是一方出来谢罪有问题，不公平。”他拉出美、苏等国，与日本同罪，至少要陪同日本谢罪。他指责日本政府轻易使用“侵略”一词是为了迎合中国。如是作“贼”，对不起日本的前辈，也对不起后代。”他跳起来吼道：“不能让外国歪曲的历史，即指明侵略，流传于世。”

这个奥野诚亮非凡夫俗子，能量大得惊人。不反省，不谢罪，是他打出的与社会党相对抗的旗号。一大批自民党政要聚集在这个旗帜之下。奥野适时地拉起一个组织，叫作“战后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吸纳了一群自民党国会议员——据说有161名加入其内。奥野自任会长，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现首相）担任顾问。这个组织十分了得，许多显要人物都居

于其中，如自民党干事长林喜郎、防务厅长官玉泽德一郎、原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原外务大臣三冢博等，这样的角儿还相当的多。把他们聚在一起是基于他们对战争的相同认识：关于过去的战争处理，已经通过缔结和平条约和媾和条约，在外交上解决了，没有必要再搞‘反省’、‘谢罪’。他们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进行“反省”，更不用说“谢罪”。这条共同的纽带把他们捆绑在一起，成为国会中的小团体。这件事出现在 1995 年 1 月底，正是“不战决议”出世前夕。

随奥野之后杀出来的是一批人，一支由自民党有脸面的头头脑脑组成的队伍。这支人马上阵，手持一种利器，那就是“国会不是历史判定的场所”。把这件武器摆弄得很娴熟的要数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这位在 80 年代提出过“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的前首相，而今直言不讳反对国会通过“谢罪决议”，理由就是在国会断定历史观不妥。1995 年 3 月，正是各党派为“不战决议”发生激烈争辩时，他在地方议会选举演说中坦率地说：“国会不是历史判定的场所，以前该向外国谢罪的都谢罪了，该赔偿的也赔偿了，还要这么做有什么意思呢？即使这样一项决议得到通过，全世界也不会接受它。”如此说来，国会根本无需通过这样的决议。在这批冲杀出来的政治要员中，比中曾根康弘更肆无忌惮的，可以说比比皆是。

有这批大人物作后盾，奥野诚亮更加有恃无恐。他带领他的“战后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充当了反对“不战决议”的急先锋、封杀这个决议的凶狠杀手。他们杀出的第一手是同社会党打“决议”战。社会党不是要搞“不战决议”吗？“议员联盟”的议员同自民党本部联手大作“决议”文章。议员们用“战

“战死者大会案”与“不战决议”案相抗衡，要国会予以通过。所谓“战死者”就是侵略战争中的战死者，“议员联盟”的成立意向书把他们称为“殉难者”。意向书说：“这些殉难者面临昭和的困难，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和平而贡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当时的通产大臣桥本龙太郎还把这些“战死者”的遗属组织成“日本遗族会”，自己充当会长。该会拥有二百多万会员，是一个势力强大的右翼团体，他们对日本“二百多万战争殉难者”齐声歌功颂德。自民党本部则指示其县议员联盟拟定“有关为在上次大战中的战死者追悼和期盼持久和平的决议案”。很快就有 17 个县议会通过了这样的决议案，其中充满了美化侵略战争的内容。用众多的“决议”去围剿一个“决议”够狠的了！

另一手也同样厉害，就是唱对台戏。按社会党安排，在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之后，还要在 8 月 15 日这天召开大会，由政府首脑发表讲话，反省过去战争，表明不战决心。自民党针锋相对，提前安排在 5 月下旬搞一次大动作，届时将在东京召开“亚细亚共生共荣的祭典”，以祭奠那些为亚洲共生共荣而战死的军人，包括日本兵、日本同盟国士兵、属于日本军的外国军队士兵等，还准备邀请那些外国兵的遗族参加。这些人拥在一起，吹吹打打，为那些战死者——其中不乏战争罪人——招魂！

拖延战，是自民党玩的又一战术。社会党自 1995 年初提出“不战决议”案后，原以为执政三党既有协议在先会顺利通过的，于是把 3 月中旬定为通过的时间，但没能实现，只好改在 4 月下旬来完成这件历史使命。自民党以地方选举为由，进行拖延。结果又落了空，再延至 6 月 18 日。看样子，自民

党还是不依不饶，继续拖延。他们说，参院选举已经开始，哪能顾上那事？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山崎拓公然说：“可以在参院选举后的临时国会上进行，8月15日来得及。”拖到那个时候，自民党是有盘算的。在参院选举中，自民党可望获得国会中过半数的席位，那样它就可以单独执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通不通过”“不战决议”就由不得社会党了。

最后一手就是“有故”和“无故”缺席。社会党面对自民党的封杀不能无动于衷，作出了最顽强的抵抗，决心不让对手的进攻处处得手。它明白，如果拖到8月参院选举之后再在国会表决“不战决议”其结果是很难预料的。3月不成，4月落空，不能再过6月。结果没等到6月18日而是6月9日就在国会付诸表决。自民党议员见阻挡无效，只好采取“赖皮”手段。那一天，有相当一部分自民党议员——据说有几十名，没有出席国会会议，其中有因事告假的，更有无故缺席的。我不在，你要搞，我就大声呼喊：“强行通过。”

自民党带头出击激励了它的伙伴——在野的新进党。在封杀“不战决议”的行动中，新进党不甘落后，有时候它比自己的老大哥自民党干得还要离谱。在新进党这支“杂牌军”里，一部分议员本来就脱胎于自民党，与后者有着天然的一致，他们公开鼓吹两党联手反对“不战决议”，乃至搞垮三党联合执政的村山政权，建立“保·保联合政权”（即两个保守党的政权），老大哥党在1995年1月拉起了“议员联盟”，新进党紧跟其后，在2月下旬拼凑出一个“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的组织，头儿们也是显赫的政治人物，原厚生大臣小泽辰男出任会长，前法务大臣、名声不佳的永野茂门担任干事长。这位曾因胡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而遭人唾弃的“丢